

## 学林

← (上接9版)

术的探究增进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和珍藏(An intrepid explorer, whose exa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and art of Central Asia enhances our appreciation of a group of ancient cultures)。而前后相继列着的胡适为“一名中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,既继承了悠久文明赋予现代人的睿智,又以其勇气和对新时代精神的领悟来引领学界(A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, an inheritor of the mature wisdom of an old civilization who guides with coura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a new age)。”

此后,伯希和在1944年10月和1945年2月再次来哈佛讲学。根据杨联陞的日记,1945年2月7日四时,他听伯希和讲“祭司王约翰与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传说”(Prester John and the First Christian Legend in China),过后还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为讲座所设的茶会。紧接着第二天四时,伯希和以“蒙古史之新研究”为题作了演讲,提到成吉思汗卒时只有六十岁,又讨论到在蒙古帝国治下基督教在乃蛮等三族中最有势力。两天后,他们一帮学者受贾德纳邀请一起上他家参加晚宴,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贾德纳做东的晚宴,从而胡适与伯希和得以再次在康桥见面。遗憾的是胡适有否参加伯希和的系列讲座,杨联陞在日记中并没提及,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,从杨联陞写日记的习惯来看,如果胡适一同前往伯希和的演讲,他准定会记上一笔。

## 6

那段时间另一则轶事也值得一记。1944年12月9日,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,杨联陞和裘开明(即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)陪胡适来到麻州西边的格雷夫顿镇(Grafton)南街16号约翰·罗兹(John L. Rhodes)家,他们浏览罗兹的伯父、老传教士罗伯特·利莱(Robert Lilley)遗留下来的一批藏书。这位利莱先生从1869年至1876年间一直在中国北方传教,1876年被派往日本横滨。19世纪末,他带回多年来在中日收集的藏书。他死后,所有的书均归侄子约翰·罗兹所有。罗兹很想把这些书卖出去,但一直没人要。有意思的是利莱身为一名新教传教士,据胡适和杨联陞的日记记录,他的藏书中除了圣经《新约》《旧约》中日

旧版译本之外,还有“明治十三年(1880)弘教书院的缩印大藏经”一部四十帙和日本“旧刻各种佛经”零种,此外还有中国旧书的“甚多佳版”。虽然胡适很为转运这一大堆书而犯愁,但是他爱心切,还是当即出了500美元把所有的藏书都买下了,罗兹甚满意,大家也皆大欢喜。

12月21日,胡适再次和杨联陞一起来到罗兹家中,两位大学者花了六个多小时,亲手把旧书整理好,装成五大箱,并托付罗兹把这五箱书交转运公司,送往胡适在纽约曼哈顿东81街的寓所。而剩下的一些小部头的书,他俩自己装入手提箱随身带上,直到更深半夜才回到波士顿。途中杨联陞即兴作小诗:

才开寿宴迎佳客,又冒严寒到草庐。

积习先生除未尽,殷勤异域访遗书。

胡适在午夜直接上车去纽约过圣诞节。圣诞刚过,12月26日,胡适寄给杨联陞他的和诗:

雪霁风尖寒彻骨,大头板屋似蜗庐。

笑君也有闲情思,助我终朝捋破书。

祖国劫刼千载无,暴敌杀掠烧屋庐。

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,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。

然后杨联陞又和胡适的诗,写了两首:

卅年尘锁无人问,

一旦提携出草庐。

只说新书读了旧,

旧书也会变新书。

又:

弘教何嫌文字障,

译经忍弃塞翁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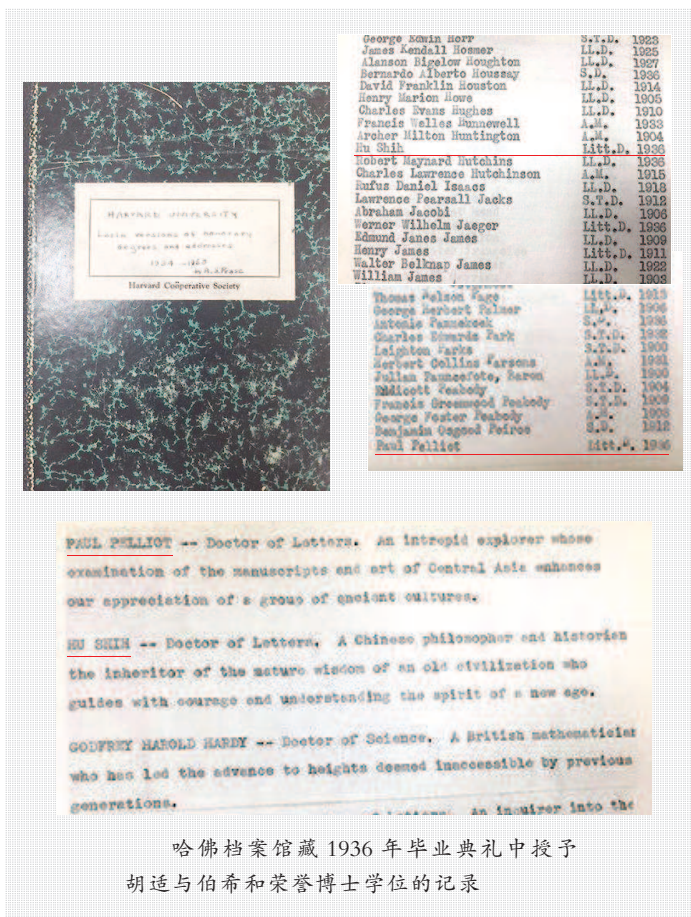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莫说无出息,

宰相犹须半部书。

这两位先生情投意合,即便在短短的圣诞和元旦节,也是和诗、书信频频往来,其中尤其是胡适的那两句白话诗句,“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,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”,充满学者乐于自嘲的十足的书生气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

## 7

1945年5月30日,胡适完成哈佛大学远东系的客座教学任务。同在康桥,这一学年他和杨联陞间的学友之谊更为深厚了。学年一结束,胡适即回纽约寓所,但是他们一直书信频频。第二年夏天,杨联陞在耶鲁任教,去纽约就更方便了,他时时去看胡适。6月28日,他写到:“作书寄适之先生。”7月6日,亲自



哈佛档案馆藏 1936 年毕业典礼中授予胡适与伯希和荣誉博士学位的记录

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,“见胡先生。还诗稿,戒油滑,劝练句。”他们又谈起了《水经注》。虽然哈佛燕京学社有邀在先,但胡适告诉他说半年后有不回哈佛任教之可能,可能胡适当时就已有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他们的交谈是一如既往地庞杂而丰富。胡适“谈乾隆时讳禁初不甚严”,然后杨联陞接收了胡适转赠的敦煌六百年一册,又借汉简考释。到了8月25日,杨联陞又去纽约看胡适。此次胡适较为明确地谈到“明春或将回国”,同时出示《水经注》提要一文,并且特意说明,他就此文“曾改写过两、三次,以弥缝乾隆题诗误解水经散见大典之缺陷。”

说到再回哈佛客座任教一事,还是出自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。1944—1945学年客座任教《中国思想史》一课结束后,学社讨论再次聘请胡适下一年度来上课,因为远东系日本学的赖世和(Edwin Reischauer)要休学术假,历史系费正清教授也不开课。刚提起这一打算时,胡适表明1945年11月他事先已另有安排,不过他可以在春季开课。于是学社把胡适这一学年的春季再来任课都已预算在案,计划1946年春季学期第二次开“中国思想史”一课。但是正如胡适和杨联陞提起的,到1945年夏天,胡适对自己下一年何去何从的计划已作重大的改动。9月初,胡适去向已明。9月10日,杨联陞写信贺任北大校长。9月26日,他乘车再次来到纽约,饭后访问胡适。胡适自然而然就谈起北大事务,意在询求康桥人才,希望杨联陞能来访任教。此后他们一个在纽

约,一个在康桥,通信不断。比如,1946年3月1日晚,贾德纳从纽约回康桥,见杨联陞说,他见了胡适,并转告即将有胡适给他的长篇来信。

1946年6月5日,胡适从复发的心脏病中恢复过来没几天,就动身回国。那天他坐乘塔夫脱总统号远洋轮离开纽约港,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:“此次留美国,凡八年八个月。别了,美国!别了,纽约!”胡适一生远渡重洋多次,这当然并非最后一次。漂洋近一月后,7月4日抵沪,他日记的笔调一下子滋生了文采:“下午三点,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。大雨。天晴后,八点一刻,海上晚霞奇艳,为生平所少见。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!”多年留洋和久居海外的学人,流露了回归故国之真情,读来令人动心。

接着胡适北上,开始担任北大校长。不到三年,国内形势骤变,他的生活不得不再次急转。1949年4月6日,胡适离开上海公祥和码头,又一次远渡重洋来美(胡适在日记里注明,这是“第六次出国”)。而这一次他来,一呆就是10年。胡适一生在美国长期生活有三段时间,加起来足有25年之久。而作为学者,这25年里唯有1944—1945学年在哈佛客座授课是他在美国正式教书授课的一段时间,而且这一学年可以说是继胡适在1936年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校庆、接受哈佛的荣誉博士学位后和哈佛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年。

再度来美寄居期间,胡适心情黯淡,国事、家事纷扰,颠

沛奔波,杨联陞依然一直和他通信,以诗文表达彼此的友情和关切,而通信中引起彼此共鸣的“待等秋风落叶,那时许你荒寒?”的诗句正寄托了这两位远离故国的学友、师生那时的心境。胡适在纽约一直住到1958年4月,之后他前往台北担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这一一反初衷,似乎出于无奈。虽然这十年里,胡适再也没机会回哈佛任教,但是和以前一样,他一有机会,就来波士顿享受他最为怡然自得的时光,来康桥和哈佛看书会友。因此,他第三次长期寓居美国时,依然笃于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缘分、和哈佛的中国学友之故旧情谊。

## 8

哈佛中国校友在哈佛建校300周年校庆时捐赠的颀颀座大理石石碑,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园内矗立。我刚来求学,穿过校园时就注意到这块石碑,立览碑文,肃然起敬:

文化为国家之命脉。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,而文化之所以盛也,实系于学。深识远见之士,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。创始也艰,自是光大而扩充之,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放于数百年间而勿替。是也,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!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,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,嗣在剑桥建设大学,即以哈佛名之;规制崇阔,学科美备,因而人才辈出,为世界有名之学府,与美国之国运争荣。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,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也,大矣。

令人惊喜的是20世纪初的30多年里,哈佛培养的中国学生竟多达千人。可那时我并不知道,碑文实出胡适之笔。时至今日,胡适来哈佛任教已有70多年之久,石碑也历经新英格兰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和侵蚀,但是碑文依然清晰可认。现今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、中国校友的数量和中国学生的规模与那个年代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,但是请中国学者来讲中国思想史似乎默然而成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。1944年秋,胡适在哈佛第一次开《中国思想史》一课,而不久前,汪晖受邀来东亚系客座讲同样一课。这正如碑文的结语所言,“自兹以往,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,必更广大扩充之,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”,可以说是践行了胡适当年期许的愿景,令今天的学子打心有慰,深感激励。

(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)